



转型期小说 “人” 的再发现

ZHUANXINGQI XIAOSHUO REN DE ZAI FAXIAN

张喜田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转型期小说“人”的再发现

ZHUANXINGQI XIAOSHUO REN DE ZAI FAXIAN

张喜田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期小说“人”的再发现/张喜田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7

ISBN 7-5615-2613-X

I. 转… II. 张… III. 小说-人物形象-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402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插页:2

字数:155 千字 印数:0 001-1 500 册

定价: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导 论:转型期小说与人
13	第一章 转型期小说创作的语境
13	第一节 工作重心的转移
17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身份确立与独立意识的觉醒
24	第三节 全球化的处境
31	第四节 文学的边缘化
35	第二章 人的需求:由欲到情
35	第一节 生存处境的关注
40	第二节 平民意识的凸显
43	第三节 市民生活的肯定
47	第四节 欲望的合法化
52	第五节 爱情的世俗化
57	第三章 个性化:自我确证
57	第一节 个性是各种历史因素的统一
60	第二节 个性化的作家

66	第三节	复制的生活的批判
69	第四节	寻找激情燃烧的岁月
72	第五节	恶劣的个性化
91	第六节	个人主义的反思
95	第四章	私人化:女性的自我确证
96	第一节	构建女性自己的传统
106	第二节	躯体写作
110	第三节	孤独
113	第五章	生态化:人的净化
113	第一节	天人合一思想的灵光再现
118	第二节	城乡对立中的自然人生观追求
125	第三节	生态的破坏与人的生态追求
134	第六章	宗教情愫:人的升华
135	第一节	反省与忏悔意识
142	第二节	宗教精神的追求
147	第三节	苦与空
159	第四节	救赎
169	第七章	叙述的功能化:人的解放
169	第一节	叙述意识的自觉
173	第二节	创设的时空
183	第三节	结构的生发性
189	结 语	
191	后 记	

导论：转型期小说与人

在本书中，“转型期”的“转型”一词是指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由以农业社会为主的传统社会结构向以工业社会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变，市场化和商业化是其标志。这个转变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转型不仅是政治经济的转变，还有文化、文学的转变。

政治经济的转变是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是指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化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以计划经济为主流转化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工作重心的转移，体现了执政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提供了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作家摆脱了“阶级斗争”观念的束缚，可以自由创作，不易被政治、路线、方向等意识形态化的条条框框所禁锢；同时，工作重心转移，是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国情的，是适合民心 and 关怀大众的，可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多彩与真实可靠的资源；而市场经济把文学推向市场，使作家面对市场规律，可以自由竞争，能够提高创作的积极性，但也容易走入唯市场化，创作可能成为市场的婢女。

文化处于转型期的风口浪尖，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新时期伊始，国人在思想文化上注重启蒙，启蒙往往以批判国民的人性弱点为主，注重形而上的思考，诸如民主、自由、反封建等。而在市场化

转型期小说“人”的再发现

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也在发生变化,价值观念由过去的利义背驰的二元对立转换到利义均衡的生态型人本需求,乃至重利轻义。中国人一般强调“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而现在市场经济强调利益,价值观念的转变使一些人尤其是人文学者把转型期视为文化的沙漠,他们对文化有一种忧虑感,迫切需要文化的继承与更新,这就产生了文化追寻的主动与自觉。随着全球化的日益逼近,人们产生了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同时伴随着海外汉学的回流,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倾向便越来越明显,对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张扬逐渐占据上风,这样对中国文化便由以批判传统为主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肯定。

小说由以“干预生活”为主转向以“干预心灵”为主,由着力描写“大写的人”转向描写“人”。以前常把文学作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文学常常服务有时甚至服从于中心工作,文学的个性也就被淹没了。到了转型期,文学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并相应地走向社会、政治、文化的边缘,小说的个性能够得以实现。文学是人性,但人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前的理想化、个性化、英雄化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单一化的人转向世俗化、平民化、复杂化的人。小说走向了世俗与“红尘”。

我们的工作重心、小说中心都逐渐向人靠拢。而人却又是一个“司芬克斯之谜”,似乎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但又是难以确切阐释的。我们只好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的、西方主流的人的认识上综合认识人的内涵,以便为我们转型期小说的人的发现提供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

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他们紧接着又强调指出：“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②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以人的基本的物质需求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的，并给予它应有的重视，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从而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在肯定这一前提的同时，他们从反面批判了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不重视这一基本物质前提，而在历史观上犯了唯心主义错误的情况。他们说：“德国人从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的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唯物史观正是从强调要用人们的物质需要，而不是像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那样用人们的思想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为开端的，并进而建立科学的历史观。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大发现，也是他们对历史理论的巨大贡献。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肯定了人的需要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之后，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只要人类存在就有需要，要让需要得以满足就必须进行生产。但是这一对矛盾是根本的、客观的，不可能得到永远的彻底的解决，因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④这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C].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31.

②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C].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32.

③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C].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32.

④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C].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32.

矛盾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而且也存在于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即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生产、需要和人的增殖三个要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便同时存在着,并且长期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正是人的无限的发展的需要与相对有限的生产水平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用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来解决这一矛盾,使人的需要暂时得以满足。而生产和其他的实践活动又使人类产生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产生新的生产实践活动。

就这样,需要和生产及其实践活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运动,形成了社会发展永恒的动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就是在这种需求与满足需求之间走向发展,实现更生的。

马斯洛的理论代表了 20 世纪西方有关人的理论的主要观点,也是比较流行与比较切合人实际的观点。在他的代表作《动机与人格》和《人的潜能和价值》两本书中,马斯洛对他的需要理论作了详细的阐述。在他看来,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能,它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决定的。他认为人的需要决定人的动机,进而认为人的需要内容有高低不同的层次性,即认为人的需要内容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五个从低到高的层次。这就是他的著名的需要五层次理论。他认为需要的满足的程度决定不同的人格:如果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对得不到满足的人的人格将会有不良影响;如果需要得到满足,那么,得到满足的人将成为具有健康人格的人。

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是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马斯洛在他的代表作《动机与人格》一书的前言中,反复强调他的人本主义理论基础。他说:“本书代表着一种不同的人性观念,一种人的崭新形象。”^①“这原来是一种新的 Zeitgeist(时代精神)的一个局部表现,

① 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

是一种新型的普遍、完整的人生观。这种新型的人本主义的 Wel-tanschauung(世界观)似乎是在用一种面貌全新、前途远大、令人振奋的方式来设想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①显而易见，马斯洛是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用人本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来构建他的知识体系和需要理论的。既然在马斯洛看来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能，而人的本能也就是指人的自然本性，那么，他所说的需要，实际上也就是指人的自然需要。即使像他所说的“高层次的需要”，如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是在低级需要满足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形成的，是一种先验的、天生的需要，同时也是指个人的需要，而不是社会性的需要。

中国人也讲物质满足与精神伦理(如仁、义、礼、知等)的追求，同时，也注重二者的统一与协调发展。“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子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人之为人的东西，那就是具有不同于动物性的品质，荀子说得非常明白：“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具有动物性，但人并不等于动物，人性应是动物性与神性的统一。

中西方文化都强调人的需要的合理性，但人是社会的人，人的需要是社会性的需要。从人的本质来看，作为具体的人，他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人既有自然性、意识性，又有社会性，但决定人的本质的是人的社会属性。人既有自然需要，也有社会需要，但从根本上看，人的需要是社会性的需要。即使人的基本的自然物

①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

质需要,如吃、喝、穿、性行为等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也已不再是与动物需要完全相同的纯粹自然需要。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他的需要已突破了直接的肉体生命的限制,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性的印记。例如,人们的吃、喝需要所包含的饮食文化,穿着需要所体现的服装艺术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东西方的文化都承认人是兽性与神性、自然性与社会性、个性与集体性的统一,人都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神性、社会性逐渐加强,而兽性、自然性则逐渐淡化。

新时期文学是以“人的发现”为自己表现的主要内容。只不过因为文艺环境的不同,文艺表现的重心也有所变化,即从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主要表现“人应是什么”到转型期主要表现“人是什么”的变化,即所谓“存在决定本质”,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先认识人在现实中的本相,再由人的生存之实去探索人的本质特性。

对转型期小说的研究是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但是从小说的本体性特点(写人与如何写人)出发进行系统的研究则不多见。虽然我们总是强调“文学是人学”,但是从人的角度研究转型期小说的则不多见,作家的人格状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人物形象的人的内涵则不太被重视。目前的小说研究着重是个案研究,而且理论方法多借鉴西方,着重是后现代的,以及哈贝马斯、巴赫金的一些理论,其实这些人大多是人本主义者,他们的研究目的是用一切方法来探讨人的生存处境与人的精神状态,而我们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些。我们中国的文化对人的认识(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对人的把握也是比较全面与辩证的,而我们对这些往往也是忽略的,人学似乎全是西学,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由于转型期是商业化、城市化的过程,而我们的人文学者受传统的浸润较深,对商业化浪潮有一种先天的拒斥态度,因此对在此语境下的小说创作常常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思想的滞后

造成了价值判断的失准。

本书从中西结合、历史与现实统一、继承与发展协调的态度出发，以人为视角，切入转型期的小说创作，经研究发现作家不仅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而且对人的表现也发生了变化，如世俗化、平民化的表现及生态性、宗教性的追求等，叙述对作家而言不仅是一种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实现人性解放的手段。本书以人来统合转型期的小说创作，显示出系统性、全面性和辩证性，在实践和理论方面获得了提升，并从中发现转型期小说新的特质来。

转型期的一切工作均围绕着人来进行，小说也以发现人、表现人为自己创作的主要使命。而人也由过去“大写的人”走向“人”、由“人应是什么”转向了“人是什么”，破除了对人的一些预设，从实际的、现实的人出发，表现了他们的生存之实与精神状态。

对“人”的表现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说现代小说的诞生便是源于人的发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人的表现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五四”时期是在反封建、启蒙的语境下发现人的，这可称为人的觉醒的阶段。在封建思想桎梏下，人似乎是不存在的，人被礼、理等控制。到了“五四”时期，人们对人的认识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一，那时人们认为：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强调“动物”和“进化”，^①人是兽性和神性的统一，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反对禁欲和理教对人的阉割；其二，强调人的个性与独立性，反对奴性和仆从性，即“任个人而排众数”，这主要是对青年而言的；其三，呼吁尊重妇女和孩子作为人的权利，不要把他们作为男人和父

① 周作人，人的文学[C]。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4。

母的附庸和财产；其四，“掙物质而张灵明”^①，强调人的精神独立和精神觉醒。鲁迅、冰心、淦女士、庐隐的一些作品均表现了这些思想。

“五四”时期基本奠定了 20 世纪中国人学的几个基本命题，即人的兽性与神性、自然性与社会性、个性与共性、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及妇女问题等。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阶级对立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在呼吁人的个性解放、反封建的同时，更强调人的阶级属性即群体特点和物质属性，重在实现阶级解放、阶级独立和物质富裕，个性相应地淹没在群体之中，或者是通过阶级解放来实现个性解放；性别意识不太突出，强调男女平等（这种平等是相应地忽略了女性的性别特点而形成的，与“五四”时代提倡在尊重女性的性别特点的前提下实现男女平等不同，即所谓“无性别的时代”），如茅盾的“时代女性”、革命罗曼蒂克创作等。这种传统延续到 1949 年以后的“17 年”的小说创作，如《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但是，这一时期物质富裕往往没有落到实处，并没有进行到底，对人的物质需要往往是打压的。“17 年”的小说创作，往往是以斗争为主，对经济建设不太关注，即使是反映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也是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而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不太关注，对人民群众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体的丰富性也不太关注；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成阶级对立或阶层差异，斗争、火药味充斥作品，而人的安逸稳定的要求则不被体现；斗争代替了发展，贫穷代替了富裕，人们在“穷过渡”、“穷光荣”中艰难度日。

到了新时期，对人的发现仍是建立在反封建专制思想与文化启蒙的语境下，是“五四”传统的延续。作家们呼唤人的个性，强调

^① 鲁迅. 文化偏至论[C]. 鲁迅. 鲁迅全集(1).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6.

精神独立等等。但对人的物质需求思考还是不太准确。虽然强调了经济建设,但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人民贫穷的原因还不是从深层次上加以探讨,还是用二元对立的态度看问题,只不过是阶级斗争转化为道德对立,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均有这种特点。

到了转型期,作家从人性的复杂性上看待人与社会的关系、看待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解放的关系,写出了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全面性,同时作家们回归传统的民本立场,富有平民意识,关注人的生存处境,肯定了多重需求的合理性。

这些对人的发现着重是强调“人应该是什么”,就是作家心中有一种人的理念,这种理念常常表现为“人是写大的”。作家觉得人应该是什么,以此来对照现实,发现人之不足,所以也就形成了以批判为主的人学表现。到了转型期,作家发现了“人是什么”,并尊重、肯定这种现状,这也是作家对“人”的尊重的体现,而不再以导师、精神领袖的角色存在于作品中。当然,在尊重现实的前提下也有所批判和追求,如对个性缺失的批判与生态环境恶化的批判,从而追求“激情”、“放浪山水”与宗教情感等。

个性化是 20 世纪对人的发现的重要成果,但是正如以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变化,个性化也呈现出了时代的特色。

小说是写人的和人写的,并且是写给人看的,而人必须具有个性,否则就千人一面,那么人类就陷入类同和重复,人也就无法认识自己,也无法区别他人,世界就陷于洪荒和混沌状态。可见,个性是人的本性之一。而小说的个性化是其存在的合法性的保证之一,是其产生审美诱惑的条件之一。小说的个性化要求就是要表现有个性的人和有个性地表现人。在以前的小说创作中,虽然也强调个性化,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将个性进行到底,个性往往形成类型,典型变成了代表性而往往忽略人物的个性,使有个性的形象和作家不是那么丰富。到了转型期,由于小说的语境的变

化,小说的个性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们对个性的认识走向全面和辩证,对个性的追求(塑造有个性的人和有个性的创作)十分自觉和积极,这样,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其表现的人物的个性就上了一个新台阶。

女性的私人化表现是转型期小说的个性化特征的另一表现。新时期前期,女性话语与男性话语形成同构,即共同对社会与传统诘问,二者皆处于意识形态的中心,而对于女性的性别与个性特点、男女性别差异不太重视。女性淹没于“大写的人”的呼吁中,而作为“个别”的人则不被重视,女性虽然浮出了“历史的地表”,但不是特写,只是一个朦胧的影子。到了转型期,女性的身影才真正显示出来,并越来越清晰。她们退出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于女性的性别意识之中,强化了自己的性别与个性意识,不再参与主流意识形态。她们走向性别意识的自觉。这样,女性主义写作便由20世纪80年代的表现女性转化为女性的表现。

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对人与非人关系的思考,以及自然灾害(火灾、洪灾、旱灾、泥石流、赤潮、咸潮、SARS等)的加剧,生态问题日益尖锐,在文艺创作中也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其实,生态问题不是在转型期才出现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就有作品已提出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如《老井》等。只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面对人的日益膨胀的欲望时,作家们尤其是一些受传统文化浸润较深者,则难以承受,希望在自然中净化人的心灵,实现一种生态人生。作家们模山范水,所触发的正是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古老记忆,满足的是人类渴求接近、回归大自然的愿望,着眼的是青山绿水、泉石清音,荡漾的是自然之趣,洋溢的是古朴之风。作者在创作时,都会浸淫于大自然,沉醉于山水云霞的清新古朴中,极力地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歌咏自然中,表达了一种隐逸情绪。隐逸与时代主流脱离,隐逸者独善其身,使身心不受外物所拘囿,自然疏朗,蓬蓬勃

勃，自由昂扬。隐逸中的自由精神丰富了隐逸文人的情感生活，隐逸中所特有的虚极、静笃、无为、无功、无名的心境为文人们艺术思维的活跃提供了良好的前提。隐逸文人的虚怀若谷，使他们可接纳万物，并能体会天地灵气与精神境界。他们反归内心，启明本心，超越有形，升入无我之境，从而成为“纯人”、“至人”。

一般认为，中国文化是缺乏宗教精神的。宗教精神包含苦难意识、忏悔意识、救赎意识，以及形而上的信仰等。中国人不太讲忏悔，至多是反省。但是，“五四”以后，受西方影响以及 20 世纪的一系列灾难，促使中国人进行思考与反省，便有了忏悔观念。我们知道，不反省的民族永远不会进步，不忏悔的民族是一个不真诚的、怯懦的民族。到新时期，随着伤痕与反思文学的产生，作家们便有了深刻的反省。随着巴金的《随想录》的出版与风靡，忏悔成为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体现。一些小说家便在小说中对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文化进行反省与批判，并追求一种抽象的、脱离尘世的信仰，直至一些作家皈依宗教（张承志、北村），依靠宗教来对人进行超度和更新民族文化。不过，宗教可以是文化与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一定是必要部分，没有宗教的文化不一定是弱智的文化，如果把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壮大的希望寄托在宗教的植入上，那中国文化将有可能发育成怪胎。

小说是讲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家思想感情的，是叙事性文学，“叙事”是其与他类文学（抒情文学、戏剧等）相区别的根本属性，而“叙事”又往往分为“叙”与“事”，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事”是主要的，而“叙”是次要的，“事”决定“叙”。但是，到了转型期，作家们大大发挥了自己的主体性，把“讲故事”放在了首要地位，而“讲的故事”却被放在了次要地位，不但“事”不能决定“讲”，反而“讲”创造了“事”。这样，作家在叙述故事、创作小说时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不再受所谓的生活的必然性的约束，而从可能性、或然性出发，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生活、塑造形象，

在叙述故事中获得了对生活的超越，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创造性得以蓬勃发展——人性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得以解放！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小说的创作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内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为小说创新提供了源泉和合法性，而国际间的碰撞与交流为小说的创新提供了借鉴和催化剂，而创作主体的身份改变和心态转移则为小说的创新提供了可能与动力，而文学的边缘化则使小说不得不改变。这种转变使小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质。这种新质就是人学观念的转变及对人表现的变化。

作家们以人为中心进行表现，本书也以作家们所进行的人的表现作为线索，梳理出作家创作的创新与不足之处，以期对转型期的小说创作进行规律性的探索，为 21 世纪中国的小说发展做引玉之砖。